

論「赤壁意象」的形成與流轉 ——「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四重奏

王文進*

摘要

東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所發生的「赤壁之戰」，不僅決定了日後三強鼎峙的歷史格局，也是日後流傳的三國故事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重要橋段。不過自三國時代起對此役的論述即陷入互為對立的解釋權爭奪戰：當三國爭霸之際，各國史官實採取專美本國的敘事立場，即使至三分歸晉之後，各國士人也各自形成對其家邦故土的描述，更藉以確保其對三國歷史之解釋正統性。

然隨著時間軸線的擴大，三國時代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逐漸消解，也使得「赤壁之戰」的論述產生新的向度，如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將其由「國事」的激情逐漸沉澱為「史事」探究的冷靜；蘇軾於謫黃時期藉詠赤壁來抒懷不遇之「心事」，以建立對三國歷史的全新解讀視角；至清初毛宗崗批本《三國志演義》採用明代楊慎〈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作為開卷之詞，不僅將故事的脈絡重新導回歷史之軌轍，也使「赤壁之戰」在「故事性」的渲染聲中與歷史巧妙疊影。是故本文將利用「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步驟，層層追述「赤壁意象」的流變軌跡，以撥顯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演變，並試圖描繪後世對「赤壁之戰」的接受與傳播的軌跡。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關鍵詞：赤壁之戰、赤壁意象、《三國志》、裴松之、司馬光、蘇軾、楊慎、毛宗崗、國事、史事、心事、故事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mages of the Battle of Red Cliffs: A Quartet of National, Historical, Mental and Narrative Matters

Wang Wen-Ch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attle of Red Cliffs fought in the 13th year of Xian Emperor regime of East-Han not only determined the historical scheme of the Three Kingdoms, but also became the most relished episode of the Three Kingdom stories. However, narratives of this battle became a battle filed of contested discourses ever since the time of the Three Kingdoms. Historians from each Kingdom took the stance of preferring one's own Kingdom over the others. Even after the Jin Dynasty unified the country, people of each Kingdom still described their once existed Kingdom in their own way, so as to ensure their descriptions of history remain canonical.

However, over the years, the tension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 period gradually dissolved, opening up new dimensions for the discourses of the Battle of Red Cliffs. For instance, in Sima Guang's *Zizhi Tongjian*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the Battle as a feverous 'national matter' was transformed into a more profound 'historical matter'; Su Shi, while being demoted, interpreted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a brand new way by writing poetries about the Battle of Red Cliffs to express his worries about not being able to be properly appreciate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opening phrase of Mao Zong-Gang'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s quoted from Yang Shen's *Lin Jiang Xian* in Ming Dynasty, 'The water of Yangtze River

rolls like thunder.’, which not only guided the context back to history, but also overlapped the narrative aspect of the Battle of Red Cliffs with historical ones. As a result, I would like to tra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mages of Red Cliffs through the layers of national, historical, mental and narrative matters, so as to exemplify its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how the Battle of Red Cliffs is interpreted and transmitted by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Battle of Red Cliffs, images of Red Cliffs,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Pei Songzhi, Sima Guang, Su Shi, Yang Shen, Mao Zhong-Gang, national matters, historical matters, mental matters, narrative matters

論「赤壁意象」的形成與流轉 ——「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四重奏¹

王文進

一、前言

東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所發生的「赤壁之戰」，不僅決定了日後三強鼎峙的歷史格局，也成為日後流傳的三國故事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重要橋段。然而弔詭的是：距離這場「國事」之爭最接近的陳壽（233-297），理應掌握許多詳盡的第一手資料，然在《三國志》中（約成書於 280-290 年），卻對此役含糊其辭，令三國各執一說²，致使一百四十年後，南朝宋裴松之（372-451）於元嘉六年（429）奉宋文帝（424-453）之命撰寫的《三國志注》中³，對此役進而參照了諸多資料，重新填實這段空缺。從《裴注》蒐集的眾多資料可發現，三國史官所議論的「赤壁之戰」雖各有巧妙，但就其質實終究不脫各自以維護本國利益為主要立場。如曹操

¹ 本文為國科會多年期研究計畫：〈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南北文化立場之探究，97-2410-H-259-034-MY3〉的成果之一。首先於 2009 年 6 月 22 日應臺北故宮博物院舉辦【捲起千堆雪——赤壁文物特展】之邀，以講綱形式公開演講，而後於 2010 年 3 月 27 日以論文形式在國立東華大學所舉辦之「第四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

² 陳壽在《三國志》中其實有規撫傳統史家「互見」、「筆削」、「輕重」、「詳略」的筆法，但在魏書武帝紀觸及赤壁之事，仍然失之於簡略。此點承學報審查委員提供高見，謹此誌謝。

³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壽書鉅敍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範圍，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純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見〔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9 月），頁 1471。

(155-220)以「瘟疫」作為其敗戰的藉口，對此役刻意含混帶過；但在立場偏袒吳國(222-280)的《江表傳》中，則不僅以高亢的筆調鉅細靡遺地記載整場戰事的過程，更順勢塑造出周瑜(175-210)在東吳開國史上的英雄地位。由此可知，當三國爭霸之際，各國史官實採取專美本國的敘事立場，即使至三分歸晉之後，原本分屬魏(220-265)、蜀(221-263)、吳三國之士人，也隨即展開對故國的追憶與懷念。不僅各自形成對其家邦故土的描述，更藉以確保其對三國歷史之解釋正統性。

然隨著時間的演變，三國時代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逐漸消解，世人對於「赤壁之戰」的態度，也由「國事」的激情逐漸沉澱為「史事」探究的冷靜，尤其至北宋(960-1127)司馬光(1019-1086)的《資治通鑑》，終於將過去零碎散見於各種文獻中的「赤壁之戰」的資料，進行較有條理的敘述，也使得「赤壁之戰」的面貌以首度有次序單一文獻的面貌完整呈現，不僅象徵「赤壁意象」的流變進入第二階段——「史事」的探究，並對日後三國故事的構成與形塑，也起了決定性的關鍵作用。如明代的〈重刊杭州考證三國志傳序〉即曰：

《三國志》一書，創自陳壽，厥後司馬文正公修《通鑑》，以曹魏嗣漢為**正統**，以蜀、吳為僭國，是非頗謬。迨紫陽朱夫子出，作《通鑑綱目》，繼《春秋》絕筆，始進蜀漢為正統，吳、魏為僭國，於人心正而大道明，則昭烈紹漢之意，始暴白於天下矣。**然因之有志不可汨沒**，羅貫中氏又編為通俗演義，使之明白易曉，而愚夫俗士，亦庶幾之所講讀焉。⁴

從中實可一窺三國故事轉變的兩大軌跡，其一是「正統論」的爭執，顯然司馬光與朱熹(1130-1200)的看法南轅北轍⁵，然後世浸淫於程朱理學的體系下而「尊劉貶曹」，也使《三國志通俗演義》以蜀漢為正統的敘事立場更加堅固，亦勢必影響著許多情節內容的改造與創新⁶。其二則是三國故事中的「情志」內涵，〈序〉文認為

⁴〔明〕萬曆本《新刻京本補遺通俗演義三國全傳》，收錄於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頁246。

⁵有關宋代對「正統論」的意見，可參考吳懷祺：〈正統論和史書的編纂〉，見氏著：《中國史學思想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5月），頁244-251。

⁶羅德榮在《〈三國演義〉與「歷史——傳奇」體系》中指出：「（赤壁之戰）在陳壽《三國志》中，或敘述簡略，或一筆帶過，但在作品中卻發展為極其豐富、極其生動的故事：情節的具體內容，幾乎

羅貫中（元末明初）所編撰通俗演義，讓三國故事之「志」得以流傳於市井白丁，但此論卻無法涵括作者本身，更何況羅貫中亦無留下任何「明其志」之證據，故「述志」之說始終存有令人臆測的疑慮。

真正完成藉「赤壁意象」抒懷已志的，應以蘇軾（1037-1101）為代表，東坡因「烏臺詩案」貶謫黃州（神宗元豐三年二月至七年四月，1080-1084），期間多次偕友遊於「赤鼻磯」，而寫下一系列的赤壁文學：〈念奴嬌·大江東去〉、〈前赤壁賦〉、〈後赤壁賦〉、〈秦太虛題名記〉、〈記赤壁〉、〈李委吹笛并引〉等等。蘇軾在這些作品中往往藉詠史或傷逝，作為抒懷自我的載體；利用謫降與不遇的「心事」遣悶，建立對三國歷史的全新解讀視角。使得「赤壁意象」突破了傳統政治上的「國事」之爭，與學術上追求「史事」真相的復刻，進而進入個人抒懷的曲折「心事」。除令「黃州赤壁」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獨具象徵的「東坡赤壁」，也開展了後世敘述三國故事的詮釋空間，足令後代文人恃以抒志，澆胸中塊壘，但也使三國赤壁逐漸偏離歷史軌道而發展⁷。直至毛宗崗批本《三國志演義》採用楊慎（1488-1559）〈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作為開卷之詞，一方面再度將故事的脈絡導回歷史的軌轍，另一方面則巧妙腕合東坡以來的抒情傳統，在其「擁劉反曹」的基本立場下，使「赤壁之戰」在「故事性」的渲染聲中，重新與歷史接軌疊影。

職此之故，本文將利用「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步驟，層層追述千餘年來「赤壁」二字在中國文學史上所引起的聯想與圖像，建構出「赤壁意象」的文化語彙，以探索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演變，並試圖描繪後世對「赤壁之戰」的接受與傳播的軌跡。

都是作者創造；由此所表現的人物性格、面貌及其所顯示的思想傾向也都與史料相去甚遠。因此，這種生發鋪張就不同於對於歷史人物事件符合原貌的加工，而是依作家審美理想所做的虛化處理。」見《三國演義學刊》編輯委員會編：《三國演義學刊》（二）（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8月），頁202。

⁷ 胡小偉曾在〈「說三分」與關羽崇拜：以蘇軾為例〉一文中指出：「蘇軾以自身遭遇，領悟到『成敗論英雄』史觀的缺失，從而顛倒了對曹操和諸葛亮的歷史評價，是一重要變化。」見盧曉衡編：《關羽、關公和關聖——中國歷史文化中的關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1月），頁345。

二、三國「國事」紛紜下的「赤壁之戰」羅生門

有關陳壽著作《三國志》的背景，歷來討論成果已頗為豐碩，俱由正統之爭的角度立論⁸，日後《裴注》之內容及體例，亦可藉四庫館臣所言得悉⁹，陳壽面對「前史闕略，多不次敘，錯謬同異，誰使正之？」¹⁰的文獻浩劫，而以「獨齊魏於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之識見「迴拔乎流俗之表」¹¹，對抗著以魏晉為正統的當代史觀，使其非藉嚴謹與秉公之筆行世不能自保，然此簡要之風，也造成對三國許多重大事件的描述顯得過於模糊，其中以著名的「赤壁之戰」最為顯著。

⁸ 自東晉(317-420)習鑿齒(?-383)著《漢晉春秋》首先發難，經南宋(1127-1279)朱熹(1130-1200)之喧騰，幾乎已成不更之論，汪榮祖即稱：「承祚帝魏抑漢，所以續魏晉之緒。而習鑿齒以晉承漢統，蓋因魏德不足以制當年，孫劉鼎立，功不足以靖亂，……承祚既帝魏矣，復以三雄並列分署，益見其重實然之旨。」參氏著：《史傳通說》(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9月)，頁140-141。故如繆鉞(1904-1995)便謂：「至於以魏為正統，乃是西晉封建史家所不得不如此做的。」參氏著：《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店，1978年12月)，頁15。雷家驥則關注陳壽《三國志》三書分行的「正朔有三」之觀念，參氏著：《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10月)，頁299。李耀仙於《〈三國志〉新衡》中認為《魏書》中載錄漢獻帝(189-220)〈禪位冊書〉即：「名正言順，這個政權的轉移，就是『曆數在躬』，足以成正統了。」參《中華文化論壇》第1期(1994年)，頁113。孫紹華於《〈三國志〉和陳壽的史識》中乃探究陳壽藉記錄劉備(161-223)之政務來維護蜀漢統漢統之迹，參《史學史研究》第2期(1997年)，頁31-32。王炳厝則於〈略論陳壽《三國志》迴護司馬氏——讀趙翼《廿二史札記》有感〉一文中指出陳壽由蜀入晉，勢不能違當局之政治立場。參《福建學刊》第6期(1997年)，頁61。而李純蛟《〈三國志〉的史學》所言應可視為對此議題之總結：「《三國志》以魏帝為本紀，表明有過漢—魏—晉這個統緒，在形式上迎合了當局爭正統的政治需要；但是從實質上講，《三國志》並不承認這個統緒是完整的。……漢末以來的形勢，就是從多極政治，最後變為三極政治的。魏、蜀、吳三國，實際上就是三個割據天下，各自獨立、互不統屬的政治實體和政治中心。……當時一些史家，如《魏書》作者王沈、《魏略》作者魚豢、《吳書》作者韋昭等，由於堅持從維護一己的割據集團的利益出發，……因而不可避免出現存己廢彼，導致三國史記載的偏缺不全。」見氏著：《〈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9月)，頁66-67。

⁹ 《四庫全書總目》於《三國志》提要曰：「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譌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參〔清〕永瑤(1743-1790)、紀昀(1724-1805)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正史類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2月)，冊二，頁16。

¹⁰ 〔東晉〕袁宏(328-376)：〈後漢紀序〉。見氏著：《後漢紀》，收錄於《兩漢紀》(張烈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6月)，序頁1。

¹¹ 〔清〕朱彝尊(1629-1709)：〈陳壽論〉。見氏著：《曝書亭集》(臺北：世界書局，1989年4月)，冊下，頁696。

陳壽對這場奠定三國鼎立的關鍵戰役，其論述方式實將三國各自爭雄之意圖展現無遺¹²，如在《魏書》的記載中，即能發現北人頻繁地以瘟疫作為官方推卸赤壁之敗的理由，如《武帝紀》中便曰：

公至赤壁，與（劉）備戰，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¹³

此處完全沒提及與周瑜（175-210）所率的東吳部隊進行決戰，卻強調與當時實力最弱的劉備進行接觸，巧妙閃躲受挫於周瑜的難堪；而僅言「不利」，顯然輕筆帶過與孫、劉聯軍對決於赤壁的慘烈戰況，最後竟以「大疫」作為不得不退軍的理由，可見曹操（155-220）從不承認赤壁戰敗的存在，而將一切完全歸罪於疫疾的產生才造成退兵的無奈，使得劉備趁勢進佔荊州江南四郡。故從阮瑀（165-212）〈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云：

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¹⁴

即可很清楚地捕捉曹軍陣營對於此役戰敗的解讀模式：其一，戰船是自己燒燬的；其二，燒船是因為瘟疫蔓延才決定停戰所為；其三，撤兵是為遠離吳會惡地，並非受到周瑜水軍擊敗而逃。在在顯示曹操諱敗以飾不甘的心態，而《魏書》的其他列傳亦頻繁地使用「疫疾」一詞於與赤壁相關的資料中，如《蔣濟傳》：

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¹⁵

又如《郭嘉傳》：

¹² 《文心雕龍·史傳》：「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見〔南朝梁〕劉勰（465-520）撰，周振甫（1911-2000）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8年9月），頁295。

¹³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見《三國志》，頁31。

¹⁴ 〔漢〕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見〔南朝梁〕蕭統（501-531）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1757-1816）考異：《文選》（李培南等點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0月），頁1892。

¹⁵ 《三國志·魏書·蔣濟傳》。見《三國志》，頁450。

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¹⁶可見不論是「疫疾」或「疾疫」，皆為北人論述「赤壁之戰」的關鍵字彙，而曹操對郭嘉（170-207）的哀嘆與追憶，則導因於其曾獻策定荊州以謀一統，據《裴注》引《傅子》所載曹操與荀彧（163-212）〈書〉曰：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荊。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¹⁷

「南方有疫」不僅是曹操對長江以南、吳會惡地先入為主的觀念，更坐實為「赤壁之戰」的戰敗藉口，從這封信中可見曹操對於郭嘉的確情有獨鍾，除了其識見過於常人外，但最重要的乃是郭嘉率先提出南征荊州的計畫，則又無意間流露對赤壁之敗的扼腕。然相較於荀彧對進兵路線的指揮¹⁸，郭嘉所言乃屬於宏觀的戰略思維，實可與魯肅（172-217）獻孫權（182-252）鼎足江東之計¹⁹，及諸葛亮（181-234）隆中對策等量齊觀²⁰，也可理解何以曹操如此重視郭嘉的原因。不過曹操的另一謀士賈詡（147-224），就曾經提出反對意見：

16 《三國志·魏書·郭嘉傳》。同前注，頁 435。

17 《三國志·魏書·郭嘉傳注》引《傅子》。同前注，頁 436。

18 《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同前注，頁 317。

19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昔高帝區區欲尊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見《三國志》，頁 1268。

20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同前注，頁 912-913。

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²¹

賈詡此言發於下江東前夕，認為曹軍可藉戰功之彪炳，與軍勢之盛大，來安撫人心，逼使敵人不戰而降，雖然其並無直言北軍將受水土不服的戰略致命傷，但卻暗指曹軍連征疲斃之狀，不支持大軍順江東下的意圖卻是很明顯的，應利用劉琮之降給予將士重整軍備以喘息。然郭嘉定荆之策，卻透露出曹操急欲出兵的重要心態：一統霸業乃事在人為，並非天命所定，由其：「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之語，可知南征荆州的決心，況且衡諸當時情勢：「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歡迎之。」²²在形勢強盛及事在人為的信念下，曹操始終認為南征荆州志在必得，但也就因此過度自信，導致忽略了重要的致命傷害——水土不服。

但面對同一場戰爭，在劉備與孫權陣營中，便與曹操產生對「赤壁之戰」的不同解讀，如《先主傳》曰：

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疫疾，北軍多死，曹公引歸。²³

此處開門見山描述孫、劉結盟的歷史，尤其孫權出兵完全是受到孔明的說服，故吳軍實與先主共同協力與曹操決戰於赤壁，才有大破曹軍並焚其舟船的戰果，又協同追逼曹寇至南郡，顯然陳壽在《蜀書》中寫赤壁之勝的立場，雖保留孫、劉二軍結盟的事實，然而行文間卻令人淡淡嗅出維護故國之思的意圖，直至文末才提及北軍因瘟疫流行導致傷亡慘重，卻已顯露蜀國所抱持擊敗曹操乃是吳、蜀聯盟共同戰果的企圖。又如在《諸葛亮傳》中即載孫權接受孔明的結盟之策：

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

²¹ 《三國志·魏書·賈詡傳》。同前注，頁330。

²²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同前注，頁1117-1118。

²³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見《三國志》，頁878。

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²⁴

另外，陳壽自己所作的〈上《諸葛亮集》表〉中也提及：

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劉）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諸葛）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素服仰備，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²⁵

上述兩則文獻，皆不約而同地將孫、劉結盟視爲赤壁戰勝之關鍵，尤其是在陳壽上〈表〉中，更不諱言孫權對劉備與孔明的欣賞，可見承祚頗有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用意。也因為劉備在戰前不僅無立錐之地，更無可戰之兵，是故在《蜀書》的記載中，陳壽便巧妙地以孔明促成孫、劉聯盟的合作，作爲對此大戰的敘述焦點。至於如《劉璋傳》曰：「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²⁶更可見在南人的立場下，「瘟疫」只是爲赤壁之勝錦上添花的插曲。

然曹營之所忌，正爲孫、劉恃以勝處，如諸葛亮遊說孫權結盟時即云：

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劉備），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徧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孫權）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²⁷

孔明指出曹軍三大弱點，其一是征途遙遠，軍士疲弊，彷彿彊弩之末，氣力用盡，百萬大軍猶如羊質虎皮，脆如齋粉；其次則是北人不習水戰，故曹操正是捨己所長、曝己所短；其三則是降曹者僅爲劉琮、蔡瑁等人，況且還受迫於曹軍之威逼，實際上荊州百姓仍心向於劉琦與劉備。因此孔明勸孫權與劉備結盟，必能逼退曹軍，以解荊州與吳會之危，促成南北三方鼎足之勢。同樣的分析也出現在周瑜勸孫權決心

²⁴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同前注，頁 915。

²⁵ 同前注，頁 930。

²⁶ 《三國志·蜀書·劉璋傳》。見《三國志》，頁 868。

²⁷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同前注，頁 915。

一搏的說辭中：

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間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²⁸

周瑜指出曹操本有內憂外患之脅；又其戰線過長，兵疲馬弊；且時值寒冬，北人不服水土，必生疫疾；最重要的是北兵不習水戰，根本是自尋死路。兩人的分析極其近似，俱注意到曹軍長征補給不力、不擅水戰、及水土不服的問題，這也形成日後南北雙方解讀「赤壁之戰」勝敗關鍵的不同之處。然而，更為詳盡的記載則出現在赤壁之戰的主力戰將《周瑜傳》中：

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駐夏口，遣諸葛亮詣（孫）權，權遂遣（周）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²⁹

這段記載清楚地描述出魏、蜀、吳三方在「赤壁之戰」中的戰略角色：軍容壯大的曹軍雖兵臨城下，卻已漸顯水土不服的萎靡之狀；而劉備陣營兵寡勢弱、節節敗退，勢必與孫權結盟才能反敗為勝；故孫權派遣周瑜、程普等驍將前往馳援。《周瑜傳》中將雙方交戰過程、黃蓋獻計火攻、曹操悵惘敗歸等情狀一一具載，這段文獻不僅顯示出孫權部隊才是在「赤壁之戰」中與曹操對決的關鍵力量，也證明著名的「火

²⁸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同前注，頁 1261-1262。

²⁹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見《三國志》，頁 1262-1263。

燒連環計」乃出自東吳陣營的老將黃蓋，根本無所謂諸葛孔明築壇借東風之事。而在《吳書》其他列傳中，也的確有較多與「赤壁之戰」過程相關的描述，如《吳主傳》：「（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³⁰或《程普傳》：「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³¹《魯肅傳》：「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³²《呂蒙傳》：「與周瑜、程普西破曹公於烏林。」³³《韓當傳》：「以中郎與周瑜等拒破曹公。」³⁴《周泰傳》：「與周瑜、程普等拒曹公於赤壁。」³⁵《甘寧傳》：「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³⁶《凌統傳》：「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³⁷《呂範傳》：「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拒破之。」³⁸從上列諸傳中可發現，周瑜實為東吳本次戰役的主要指揮官，而決定性的會戰除了赤壁火攻外，尚有烏林一役³⁹，據趙彥衛考證可知，赤壁、烏林俱為長江沿岸要地⁴⁰，則周瑜乃先有烏林之勝，後才有黃蓋所獻火攻之計，《黃蓋傳》云：「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⁴¹數條資料不僅顯示出孫權陣營於是役中，從煎熬開戰到出奇制勝的心路歷程，也可從中觀察出吳人解讀「赤壁之戰」的方式，即著重於對戰爭細節的描述，尤其是引以為傲的「火

30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同前注，頁 1118。

31 《三國志·吳書·程普傳》。同前注，頁 1283。

32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同前注，頁 1270。

33 《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同前注，頁 1274。

34 《三國志·吳書·韓當傳》。同前注，頁 1285。

35 《三國志·吳書·周泰傳》。同前注，頁 1288。

36 《三國志·吳書·甘寧傳》。同前注，頁 1293。

37 《三國志·吳書·凌統傳》。同前注，頁 1296。

38 《三國志·吳書·呂範傳》。同前注，頁 1310。

39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鄴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蠹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同前注，頁 1266。

40 〔南宋〕趙彥衛曰：「嘗以為烏林、赤壁二戰相繼，烏林之捷，又自赤壁始，不應兩地懸絕如此。……方是時，操師八十萬，首尾相接二百里，不足訝。」見氏著：《雲錄漫鈔》（傅根清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5月），頁 111。雖趙氏對赤壁戰史的考證有誤，然其指出曹軍綿亙長江的形勢卻很值得參考。

41 《三國志·吳書·黃蓋傳》。見《三國志》，頁 1285。

攻」奇計。

從三方對戰事描述的側重差別，顯然已經造成後世對「赤壁之戰」產生霧裡看花的疑慮，然陳壽面對當代史的處置，在懷有故國黍離之思的同時，又必須顧及北方魏晉政權主導下的歷史詮釋，或許這是陳壽身處當代的無奈，卻也令「赤壁之戰」在國事紛紜下，產生各說各話的羅生門⁴²。

三、「史事」研究下對「赤壁之戰」真相的還原

西晉（265-316）於公元 280 年完成統一，雖使三國歸晉看似前途光明，沒想到卻是盛世假象而導致日後產生更慘痛的分裂政局，中樞政府控制力量的崩解，也使得三國人士重新有機會對故國歷史不絕於縷地各自表述，而其中有些材料甚至是陳壽未能及見。故藉裴松之《三國志注》中所引述的資料排比，乃呈現出魏、蜀、吳三國人士對自家政權的詮釋建構，及西晉統一後南北士人對故國意象的緬懷追憶，透露出另一種陳述歷史真實的方式⁴³。

《江表傳》應該是對「赤壁之戰」記載最為詳盡的資料。是書雖由晉吏虞溥所編，藉以蒐集當地民情，故表面上看似由北方立場來定位南方江表偏夷之視野，實際上其內容卻保存著江東地區人士話語之原貌⁴⁴，此即《江表傳》產生偏向吳國立場的原因⁴⁵，這可從其對「赤壁之戰」的紀錄看出端倪，戰事即由曹操挑釁開始：

⁴² 有關「赤壁之戰」魏、蜀、吳三方史料予重予輕，詳參張大可：〈赤壁之戰考辨〉，收入於氏著：《三國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頁78-90。

⁴³ 如張新科即稱：「從《裴注》所引雜傳來看，雜傳雖不像正史那樣反映重大的社會歷史變化，但它們往往從不同的側面展現歷史，反映現實，仍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見氏著：《〈三國志注〉所引雜傳述略》，《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5期（2003年9月），頁35。而相關研究最新資料可參考馬艷輝〈《三國志》裴注的理論價值〉，《中州學刊》第3期（總159期）（2007年5月），頁198-201。

⁴⁴ 參拙著：〈江表傳的東吳意象〉。宣讀於2009年12月30日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咖啡與學術」講論會。

⁴⁵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孫盛（302-374）曰：「《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見

「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群臣，莫不嚮震失色。⁴⁶

接著吳、蜀聯盟的建立：

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⁴⁷

進而是吳國將帥對敵我虛實胸有成竹的衡量與自信：

（周）瑜請見（孫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

⁴⁸

最後則是孫權的乾坤一擲：

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曹）操者，與此案同！」……權撫（周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⁴⁹

至最關鍵的火攻曹艦，則先敘黃蓋詐降投書以誘曹操輕敵：

黃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

《三國志》，頁 879。

⁴⁶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注》引《江表傳》。同前注，頁 1118。

⁴⁷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江表傳》。同前注，頁 878。

⁴⁸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同前注，頁 1262。

⁴⁹ 同前注。

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敕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⁵⁰

待其上當後正式施行火燒連環之計：

至戰日，（黃）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⁵¹

從中可見東吳政府對這場戰役的重視，並始終是引以為傲的光榮記憶，若與陳壽《三國志》的記載互相比對，則更顯出《江表傳》對戰爭過程的細膩描述，利用鉅細靡遺、娓娓道來的戰況紀錄，不僅強化了其述說歷史的可信度，相對亦提高東吳在此役中的彪炳戰功。

這種以自身利益為錄史要件之立場，實普遍存在於當時眾多的文獻資料中，如《山陽公載記》便曰：

（曹）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⁵²

雖然裴松之認為「袁曄（著有《獻帝春秋》）、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⁵³且孫盛在《異同評》中即辨析此則記載之虛謬⁵⁴，但從其本身的記載卻可觀察《山陽公載記》對「赤壁之戰」的認知，樂資的立場似較偏向劉備，因其不僅將火攻奇計歸於先主，更直書曹操落荒而逃的窘狀，文末甚至擬操之口謂劉備乃「吾儔也」，

⁵⁰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同前注，頁1263。

⁵¹ 同前注。

⁵²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樂資《山陽公載記》。同前注，頁31。

⁵³ 《三國志·蜀書·馬超傳注》。同前注，頁947。

⁵⁴ 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同前注，頁31-32。

正呼應《先主傳》中所載：「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袁）本初之徒，不足數也」⁵⁵之語，最後竟還對劉備火攻奇計表示讚許，俱難想像是曹營中人所言，且全文內容實與北人藉「疫疾」為脫罪之辭差異甚大，更別說還直敘曹操敗軍慘況，可見《山陽公載記》的立場並非偏向曹魏，反而讀來頗有仇魏親蜀之況味，這或許與其乃漢獻帝遜位後所屬史官之作的因素來思考⁵⁶。又如韋昭（204-273）的《吳書》在討論「赤壁之戰」時，也與《江表傳》有異曲同工之妙：

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疆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⁵⁷

身為吳國史官的韋昭，當然不會吝筆於宣揚國家英雄之戰史，故與《江表傳》同樣詳盡記載戰爭過程的細節，讓人感受赤壁鏖兵如在目前。下文則更能體會出吳、蜀兩國在解讀「赤壁之戰」時的立場差距：

（關）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魯）肅曰：「不然。始與豫州（劉備）觀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孫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益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⁵⁸

此文所載已是赤壁戰後，吳、蜀兩國爭奪荊州主權的陣前談判，雙方雖皆以赤壁戰績為談判籌碼，然在吳國史官筆下，關羽（?-220）勢必理屈於吳，但從雙方言談間可見，蜀國極力強調吳、蜀聯盟的事實，企圖爭取在聯軍中的作戰貢獻，欲藉以取得聯盟的主導地位；然魯肅卻一語戳破關羽所恃，並直陳劉備當時勢寡人衰，根本無力抵抗曹軍，故吳人始終認為赤壁之戰是：「周瑜驅我偏師，黜之（曹操）赤

⁵⁵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同前注，頁 875。

⁵⁶ 張大可：〈赤壁之戰考辨〉，《三國史研究》，頁 80。

⁵⁷ 《三國志·吳書·黃蓋傳注》引《吳書》。見《三國志》，頁 1285。

⁵⁸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注》引《吳書》。同前注，頁 1272。

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⁵⁹獨力完成的曠世巨擘。故《江表傳》記載：「後（曹操）書與（孫）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⁶⁰此信或有吳人偽造的可能⁶¹，但信中所顯示的正是當時北人不甘兵敗赤壁的心態，只好以「瘟疫」為推託之辭，卻也表達出吳人對其遁辭之反諷；而從曹操斥周瑜戰功為虛名，除凸顯公瑾在吳國歷史上的英雄圖騰⁶²，也更加掌控吳國對赤壁戰史的解釋權。

相較於《江表傳》或《吳書》的詳細記載，北方史書系統至今所留下對赤壁之戰的著墨明顯偏少，僅如魏國史官魚豢所載有關曹操南征前獲婁圭之策⁶³，平荆後得趙戩之賢⁶⁴，而西晉宗室司馬彪（243-306）與隨晉室南渡的史官干寶，則皆紀錄著荆州必敗的謠讖⁶⁵，顯然北地系統的史料文獻，正轉移了對「赤壁之戰」的論述焦點，由過去的「疫疾」蔓延，轉變為描述劉表（?-208）無能。倒是託名王粲（177-217）的《漢末英雄記》錄有以下兩則資料：

曹操進軍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船，作竹棹，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來，

⁵⁹〔晉〕陸機（261-303）：〈辨亡論〉。見劉運好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12月），冊下，頁989。

⁶⁰《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1265。

⁶¹張大可：〈赤壁之戰考辨〉，《三國史研究》，頁87-88。

⁶²參拙著：〈江表傳的東吳意象〉。

⁶³《三國志·魏書·崔琰傳注》引魚豢《魏略》曰：「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劉表亡，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見《三國志》，頁373-374。

⁶⁴《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魚豢《典略》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三輔亂，戩客荊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同前注，頁883。

⁶⁵《三國志·蜀書·周羣傳注》引司馬彪《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嵩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野，羣以為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荊州。」同前注，頁1020。又《三國志·魏書·劉表傳注》引干寶《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平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于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谷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同前注，頁214-215。

下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輕舸百艘，燒棹。操乃夜走。

周瑜鎮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無船，乘籬從漢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輕船走舸數百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燃，則迴船走去，去復還燒者，須臾燒數千籬。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走。⁶⁶

兩則資料皆指出曹操受周瑜火攻而敗逃之事，足見其所言並無袒護曹操之意，即使未必為南人所造，但卻不見以「疫疾」作為論史之進路，則可知應也是與曹營較無關係者所為。然藉由上述文獻的整理，可以發現自三國歸晉後，對於三國史的研究亦眾說紛紜，彼此皆為爭奪對歷史詮釋的主導權，故也造成對於「赤壁之戰」相差甚大的解讀，直至裴松之《三國志注》才將此事件完全擺脫三國政事的紛爭泥淖，以「統一觀」與「天命觀」來統攝「赤壁之戰」造成三國鼎峙的關係：

臣松之以為（賈）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遂）、馬（超）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權）、劉（備）之所必爭也。荊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荊楚楫櫂之手，實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於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為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⁶⁷

裴松之的立場顯然強烈支持曹操用兵赤壁，原因在於衡諸當時，只有曹操具備結束漢末軍閥割據亂局的能力，故其認為賈詡勸阻南征乃不合時宜，因若錯失此次良機，日後吳、蜀勢必坐大，統一將更難達成，可見裴松之主戰的立場，完全著眼於僅曹操具有統一天下的實力⁶⁸。不過，雖然裴氏指出曹操兵折赤壁之關鍵在於：「疾疫

⁶⁶ 俱見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4月），頁213、250。

⁶⁷ 《三國志·魏書·賈詡傳注》。見《三國志》，頁330。

⁶⁸ 參拙著：〈論裴松之的統一觀〉，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六朝學刊》第1期（2004年12月），頁45-60。

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但其仍堅持曹操東下吳會之決策無誤，因為對照日後劉曄所獻進攻漢中之策，對蜀漢所造成的壓力看來，曹操即使兵敗赤壁，依舊是當時最有實力完成一統天下的人選，故利用裴氏的語脈，可以嗅出其認為孫、劉聯軍本無勝算，對「赤壁之戰」挫敗於「瘟疫」與「東風」頗示無奈，裴氏不僅對賈詡短淺的戰略眼光嗤之以鼻，也將決勝赤壁的原因拉高到「天命」的層次，視為曹操雖佔盡絕對優勢卻「遺恨失吞吳」的原因。

裴松之的統一訴求實有其時代之需要⁶⁹，卻也拓展了其對「赤壁之戰」重新解讀的視野，而裴氏搜羅自三國至劉宋時期與赤壁相關的戰史資料，顯然對「赤壁之戰」脫離過去鼎峙對立之下的羅生門頗有幫助，也代表著「赤壁意象」已由過去的「國事」之紛紜，轉進「史事」探原的學術研究位階，而最後完成這一圖像者，即是司馬光領撰的《資治通鑑》。在「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眾說，成一家書」⁷⁰的原則下，將「赤壁之戰」的來龍去脈作一精簡卻詳盡的描述。根據張元對司馬光描寫南北朝戰爭特色的敘述：

溫公寫定通鑑之先，助手將所有資料依時間次序抄成長編，溫公再據之刪正改寫。南北朝的資料是由劉恕負責完成。在煩多冗雜的資料長編中，溫公如何措手撰寫戰爭呢？他首先決定選取的題材，然後將資料上的矛盾、重覆或錯誤都儘可能地加以訂正，這就是考異的工作。這些題材必須照顧到戰爭的完整性，諸如：戰爭的蘊釀，戰略的設計，軍隊的部署，戰鬥的經過以及勝負結果與影響檢討等，儘可能地加以記載。⁷¹

劉恕實際上負責的斷代還包括三國與隋朝⁷²，故張元上述雖僅止於南北朝，然司馬

⁶⁹ 盧建榮：〈裴松之歷史評論的思想根源——兼論尊經傳統的回應〉，收錄於《中國歷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493-517。

⁷⁰ 劉恕（1032-1078）〈通鑑外紀後序〉引司馬光之言。見氏著：《通鑑外紀》，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312，頁659。

⁷¹ 張元：〈通鑑中的南北戰爭〉，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編：《紀念司馬光、王安石逝世九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10月），頁67-68。

⁷² 張須（1895-1968）曾分析與修《通鑑》相關的手帖書信，而認為司馬康（1050-1090）所言：「此書之成，蓋得人焉；……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劉恕）」是較為核實的說法。參氏著：《通鑑學》（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2年9月），頁40-41。

光處理「赤壁之戰」史料的方式，應該也大致符合上述原則；而根據遼耀東（1932-2006）對司馬光《通鑑考異》的考證，可知當中與三國史有關的論證，其文獻資料來源俱引自裴松之《三國志注》⁷³，因此我們實可推論，溫公乃參考《裴注》以呈現「赤壁之戰」的完整圖像⁷⁴。

如寫戰爭的蘊釀，便藉由魯肅與諸葛亮先後建言孫權聯盟抗曹，以凸顯曹軍壓境下的壓力；而兩人於規擘結盟之際，亦皆以鼎足之勢作為戰略設計；然司馬光亦未忽略張昭（156-236）等人的反對聲浪，並綴續魯肅正言若反的激將法，與周瑜戰前精密的分析，使孫權終於決心一戰。有趣的是，司馬光將這些原本分散在陳壽《三國志》中《蜀書·先主傳》、《蜀書·諸葛亮傳》與《吳書·吳主傳》、《吳書·張昭傳》、《吳書·魯肅傳》等處的記載，利用年月日先後排列的方式重新綴合⁷⁵，除了讓事件能較為連貫地呈現外，也意味著司馬光以歷史研究的眼光，對這場戰事進行客觀地描述⁷⁶。而進入赤壁戰場後，司馬光顯然把作戰主力——周瑜部隊從備戰至決戰過程做詳盡的報導：

是夜，（周）瑜復見（孫）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劉）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孤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張昭）、元表（秦松）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魯肅）與孤同耳，此

⁷³ 遼耀東：〈司馬光《通鑑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臺大歷史學報》第21期（1997年12月），頁125-145。

⁷⁴ 韓國磐（1919-2003）：〈《資治通鑑》如何記述赤壁之戰〉，《社會科學戰線》第4期（1982年），頁112-117。

⁷⁵ 王德毅於〈司馬光的史學〉中即指出：「《通鑑》的纂修，是採分工合作的方法，（劉）恕、（劉）攽和（范）祖禹各負責整修一個斷代的史事編年，彙集這一斷代的各種記事之書，依年月日先後排列纂成草卷，粗略的叫叢目，詳備的稱長編。」參《紀念司馬光、王安石逝世九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7。

⁷⁶ 《四庫全書總目》對於《通鑑考異》的提要即指出：「昔陳壽作《三國志》，裴松之注之，詳引諸書錯互之文，折衷以歸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見《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二，頁57。

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普）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⁷⁷

上文除記敘著周瑜戰前勝券在握的自信，與孫權臨行餞送之壯志豪情外，還直書劉備困窘無措的狀態，顯然司馬光在此採用了《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及虞溥《江表傳》的說法，但在其對史料文獻進行判讀後，認為「赤壁之戰」與曹軍對決的主力是周瑜，並非劉備，故於文末蘊味深遠地書「備深愧喜」之貌，此語意所承實來自《江表傳》：

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

⁷⁷ 見〔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1230-1302）音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9月），頁2091-2092。值得一提的是，張元曾經指出：「寫南北朝時期戰爭，寫得最精確的是呂思勉的《兩晉南北朝史》，他對於整個過程都做了相當詳盡的考證，但是非常的枯燥、生硬，無法卒讀。這與讀《通鑑》時感動得手舞足蹈，甚至流淚，大不相同。此乃因前者將過去的事情做最精審的考訂，後者則以戰爭中所體現出人物的一些表現為重點。」可視為對司馬光整理與改寫《裴注》煩雜的資料之最佳註腳。引文見《紀念司馬光、王安石逝世九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31。

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⁷⁸

《江表傳》以小吏識船之語反襯劉備驚惶失措的忐忑，文末甚至還描述了劉、關、張（張飛，？-221）三人觀望戰局的態度，而將其塑造為私自集結兵馬、不服周瑜指揮、意欲壁上閑觀、圖謀斷尾求生的小人，顯露其欲摧毀先主神話之用心，也顯示出三國史料始終存在著構間敵國的戰時思維。但司馬光對於《江表傳》的敘述並非全盤接受，畢竟早在東晉時孫盛就已對此記載抱持疑慮：「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⁷⁹互為對照後，可以發現司馬光僅保留足以顯出劉備兵窮勢微之詞，對《江表傳》可能具有構間詆毀的成分則加以刪汰，而從胡三省《資治通鑑注》之語更能體會溫公字斟句酌的苦心：「愧者，自愧呼肅之非；喜者，喜瑜之整也。」⁸⁰由此也可領略《資治通鑑》與《江表傳》間的立場差距，司馬光雖仍保留劉備羞愧的情緒，然卻已不若《江表傳》中所述因理虧而懷恨的小人模樣，轉變為富有自省且知恩感激的德人；且《江表傳》所不斷強調劉備的軟弱，意欲壁上閑觀、圖謀斷尾求生，存心破壞孫、劉聯盟之局，但在《資治通鑑》中，藉胡氏注語更顯出劉備對周瑜心生敬佩的器度，與對戰局充滿信心。至於最精采的決戰過程：

進，與（曹）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眾，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

⁷⁸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879。

⁷⁹ 同前注。

⁸⁰ 見《資治通鑑》，頁 2092。

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⁸¹

司馬光分別擷取《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江表傳》、《山陽公載記》等書的部分內容，加以鎔鑄精練、去蕪存菁，故文中不僅記錄著黃蓋為火攻功臣；亦不諱言劉備、周瑜水陸並進，共同協力追逐曹操敗軍；也直書曹軍慘敗逃竄慘狀，但也不吝於對曹操處亂軍中依舊冷靜部署、指揮若定之姿。最後則引習鑿齒論曹操驕伐作為對「赤壁之戰」的總結：「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⁸²由司馬光所擷取習氏之論的部份可以察知，其乃欲將歷史的發展導回客觀歷史事件之討論，與裴松之渴慕統一政局的急切，及其稍就天命袒護曹操南爭之敗相比，司馬光則把「赤壁之戰」視為與春秋亂局時（770B.C.-476B.C.）的諸侯爭戰相似，雖與習鑿齒一樣將曹操比之齊桓（?-643B.C.），卻俱以驕矜致敗的結局貶之，足見司馬光論史的高度實與三國六朝的史官有所不同，甚至比裴松之更加純粹地就事論事，指出曹操驕兵必敗，卻無涉於正統之論或人物好惡，完全將「國事」競爭意識型態消弭於六朝文獻中⁸³，使赤壁意象提升至客觀的「史事」研究位階，後人也得以明白此役始末：對決主力實為周瑜部隊；火攻之計乃來自黃蓋；劉、孫彼此確須靠結盟才有機會反敗為勝；曹操即使慘敗卻仍臨危不亂；而最使後人津津樂道的孔明，在是役中卻貢獻無多。

可見司馬光為求符合簡要筆韻，必須對文獻進行揀擇汰煩，雖可能令人產生其重塑歷史之慮⁸⁴，但若將《資治通鑑》敘史內容重核於原始文獻，便能顯出溫公忠

⁸¹ 同前注，頁 2093。

⁸² 同前注，頁 2095。

⁸³ 如習鑿齒曾揚諸葛亮而貶周瑜、魯肅為「小人」：「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托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崇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哉！」見喬治忠校注：《眾家編年體晉史》（天津：古籍社出版，1989年），頁9。足見習氏以復「漢」之正統成為其論史的立場，而產生主觀好惡之評判，失去對史事的客觀解讀。

⁸⁴ 〔美國〕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利用「塑造模範」一語，指出司馬光於修史過程中試圖置入自我主觀價值，而這將對歷史的真實性造成疑慮。然在其論證過程中，僅著眼於最富史家主體性的「史論」處，卻沒有利用「文獻重核」的方法仔細檢視溫公精要的筆韻，對司馬光的史學評價頗為苛刻。參氏著：〈史學與文化思想：司馬光對諸葛亮故事的重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於史實的立場乃無庸置疑，而此客觀的治史心態，也使「赤壁意象」在歷經近九百年後，終於擺脫「國事」紛云之泥淖，而回歸「史事」研究之客觀。

四、東坡藉赤壁意象抒懷「心事」所建立的抒情典型

然「赤壁之戰」除了具顯在國事之爭紛紜中，或史事客觀載錄的學術研究之外，亦成爲後世文學書詠之重要意象。如東晉（317-420）袁宏《東征賦》曰：「惟吾生於未運，托一葉於鄧林，顧微軀之眇眇，若絕響之遺音。壯公瑾之明達，吐不世之奇策。挫百勝於崇朝，靡雲旗於赤壁。」⁸⁵又其《三國名臣贊·周瑜》所云：「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⁸⁶梁元帝（552-554）亦曾致書其弟蕭紀（508-553）曰：「雖復結壇待將，褰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智將殫。金貝殆竭，傍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⁸⁷袁宏在《三國名臣贊》中以赤壁大捷作爲對周瑜一生之定評，故在《東征賦》中，便藉周瑜之功業以悲自我之不遇。而梁元帝則藉「赤壁之兵」喻壓境的北軍西魏部隊，藉孫、劉聯盟之故事來宣諭專制岷蜀、欲圖荆陝的手足兄弟蕭紀，盼其能同心對抗胡兵⁸⁸。可見「赤壁」已逐漸建立其在文學意象上的譬喻系統。至唐代（618-907）起，「赤壁意象」便不斷出現在詩作中，如李白

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一分（2002年3月），頁165-198。而明代的〈新刻續編三國志序〉曰：「涑水編其年，而細微之事則略。」見《三國演義資料匯編》，頁560。但這是持「揚劉貶曹」的讀者對司馬光「以魏爲正統」的偏見，事實上司馬光將錯綜複雜的各種史料，字斟句酌地濃縮呈現在2510字的篇幅裡，已清楚地描述「赤壁之戰」來龍去脈。

⁸⁵ 見〔清〕嚴可均（1762-1843）輯：《全晉文》（何宛屏等審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2月），冊中，頁590。

⁸⁶ 見《文選》，頁2133。

⁸⁷ 《梁書·武陵王紀傳》。見〔隋〕姚察（533-606），〔唐〕姚思廉（557-637）、魏徵（580-643）合撰：《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9月），頁827。

⁸⁸ 《梁書·武陵王紀傳》記載蕭紀於西元552年於成都即位，年號天正。見《梁書》，頁826。

(701-762)〈赤壁歌送別〉：「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⁸⁹杜甫(712-770)則有〈過南岳入洞庭湖〉：「悠悠迴赤壁，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⁹⁰而在晚唐盛行的詠史詩中，胡曾與孫元晏皆曾論及赤壁戰火：「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開國虎爭時。交兵不假揮長劍，已挫英雄百萬師。」⁹¹、「會獵書來舉國驚，只應周魯不教迎。曹公一戰奔波後，赤壁功傳萬古名。」⁹²上列資料所反映出的「赤壁意象」，乃為詩人對歷史的議論⁹³，很清楚地顯示唐代詩人偏好採用周瑜與曹操之對決來詮釋「赤壁之戰」；然對雙雄爭霸之刻畫顯然引導出「赤壁意象」的另一作用，即因事興感，而抒今昔盛衰的人事之慨⁹⁴。如李白〈江夏贈韋南陵冰〉：「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⁹⁵使赤壁烽火、諸雄爭霸恍若隔夢，人事紛擾盡付歌舞消愁。而最著名者應為杜牧(803-852)〈赤壁〉：

折戟沈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⁹⁶

此詩乃杜牧於會昌二年至四年(842-844)任黃州刺史時所作⁹⁷，若參考謝枋得(1226-1289)所言：「眾人詠赤壁只善當時之勝，杜牧之詠赤壁獨憂當時之敗。」⁹⁸則上述二項條件有助我們理解杜牧對赤壁戰場之認知，及此詩所寓含之義。吳喬《圍爐詩話》曾謂杜牧《赤壁》「用意隱然」實最得詠史之體：「古人詠史，但敘事而

⁸⁹ 見瞿蛻園(1894-1973)、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冊上，頁570。

⁹⁰ 見〔清〕仇兆鰲(1638-1713?)：《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月)，冊五，頁1951。

⁹¹ 胡曾：〈赤壁〉。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月)，頁7430。

⁹² 孫元晏：〈赤壁〉。同前注，頁8702。

⁹³ 許鋼：《詠史詩與中國泛歷史主義》(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8月)，頁15-16。

⁹⁴ 齊益壽教授在其：〈多重「對話」與「讀者」反應——陶淵明三首「以史為體」的詠史詩探微〉一文中，提出閱讀中國古典詠史詩的兩種方式，其一是較具普遍性的「以史為用」，其次則為受人目之為「質木無文」的「以史為體」。顯然唐代有關赤壁史事為題的詩作，亦存在著由「以史為體」轉變為「以史為用」的過程。齊文見洪漢鼎、傅永軍編：《中國詮釋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五輯，頁183-200。

⁹⁵ 見《李白集校注》，頁745。

⁹⁶ 吳在慶撰：《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0月)，冊二，頁501。

⁹⁷ 同前注，頁502。

⁹⁸ 引自謝枋得：《疊山先生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同前注，頁505。

不出己意，則史也，非詩也；出己意，發議論，而斧鑿錚錚，又落宋人之病。」⁹⁹則杜牧必然有意為之，而從羅大經（1196-1252）《鶴林玉露》言及：「周瑜赤壁、謝安淝水、寇萊公壇淵、陳魯公采石，四勝大略相似。」¹⁰⁰或可稍窺杜牧本意，雖不至於如王堯衢謂其因不滿周瑜兵法所發¹⁰¹，但卻也能感受杜牧懷憂國政、悲己不遇的抒情遣志¹⁰²，實初步完成藉「赤壁」的歷史抒懷個人情志的意象類型。

二百三十八年後，蘇軾因新舊黨爭所引發的「烏臺詩案」遭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經過「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¹⁰³的死裡逃生，與黃州艱苦的生活環境：「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其與窮者相宣。」¹⁰⁴促使蘇軾對於物我關係產生新的體悟：「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¹⁰⁵而在這種心境下，東坡的赤壁之遊也就與杜牧的詠史憂國產生差異¹⁰⁶，蘇軾自己很清楚黃州赤壁並非「赤壁之戰」的真正戰場¹⁰⁷，不若杜牧乃由歷史記憶出發所感懷¹⁰⁸，東坡赤壁一開始即已自覺地脫離歷

⁹⁹ 引自吳喬：《圍爐詩話》，同前注，頁 508。

¹⁰⁰ 引自羅大經：《鶴林玉露》，同前注，頁 503。

¹⁰¹ 王堯衢《唐詩合解》謂：「『折戟沈沙鐵未銷』，吳魏鏖兵赤壁所遺之折戟，沉于沙際，唐去吳日子未遠，故其鐵尚未消磨。『自將磨洗認前朝』，自將折戟磨洗一認，信是魏武敗于周郎，而前朝之遺跡宛然。夫周郎何以遂能勝魏武，似乎難信，所以要認。『東風不與周郎便』，周郎之所以勝魏武者，恃有東風之便，所以得成功於火攻，今乃反其說，云假如當日沒有東風，則是無便可乘了。『銅雀春深鎖二喬』，周郎若無東風之便，不但不能破魏，恐江東必為未破，妻之不保，大喬小喬春深時貯在銅雀臺上矣。此以議論行詩者。杜牧精於兵法，此詩似有不足周郎處。」同前注，頁 511。

¹⁰² 魏慶之《詩人玉屑》曾論杜牧此詩：「正是《楚辭》所謂『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致死而不得逞』。乃嚴助所作《哀時命》。」同前注，頁 503-504。

¹⁰³ 蘇軾：〈到黃州謝表〉。見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月），冊二，頁 654。

¹⁰⁴ 蘇軾：〈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之一。見《蘇軾文集》，冊四，頁 1412。

¹⁰⁵ 蘇軾：〈黃州安國寺記〉。見《蘇軾文集》，冊二，頁 392。

¹⁰⁶ 直至宋詩，仍舊以藉史憂國的型態來書寫赤壁意象，如南北宋之交的程俱（1078-1144）〈北固懷古〉：「……當時鼎足計未成，聊此一奇空赤壁。人隨流水去不還，臥羊頑石留空山。如今留石亦煨燼，山與長江相向闊。」顯然在詠史之餘，還透露出對南宋怯戰偏安的苟且心態的哀慟。見《三國演義資料彙編》，頁 114。

¹⁰⁷ 蘇軾：〈與范子豐八首〉之七：「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又〈記赤壁〉亦曰：「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分見《蘇軾文集》，冊四，頁 1452；冊五，頁 2255。

史，轉為安置個人感情之載體¹⁰⁹，如〈念奴嬌·赤壁懷古〉：「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¹¹⁰便為東坡開展對赤壁歷史重新詮釋的心證，因此對於客問所言：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¹¹¹

將賦詩論史之豪氣，與巧構黃州赤壁形勝之筆，皆收束在「而今安在哉」之疑語，顯露出東坡重構赤壁意象的巧意，而這正是對〈念奴嬌·赤壁懷古〉：「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¹¹²更加細膩與深刻的衍繹。細按東坡黃州詞作，可以發現一條自我心路歷程的軌跡，在黃州首篇作品〈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中，仍保有「揀盡寒枝不肯棲」的傲氣¹¹³，但在元豐五年（1082）所作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¹¹⁴卻已顯見其任天而動的坦然心境¹¹⁵，

¹⁰⁸ 石守謙：〈古蹟·史料·記憶·危機〉，《當代》第92期（1993年12月），頁15。

¹⁰⁹ 林語堂（1895-1976）所言應是最能捕捉東坡心事者：「蘇東坡這種解脫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變化，這種變化遂表現在他的寫作上。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談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覺道出，同時把人在這個紅塵生活裡可享受的大自然豐厚的賜與表明。」見氏著，張振玉譯：《蘇東坡傳》（臺南：德華出版社，1979年11月），頁238-239。

¹¹⁰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見鄒同慶、王宗堂著：《蘇軾詞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0月），冊中，頁398。

¹¹¹ 蘇軾：〈赤壁賦〉。見《蘇軾文集》，冊一，頁6。

¹¹²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蘇軾詞編年校注》，冊中，頁398。

¹¹³ 蘇軾：〈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蘇軾詞編年校注》，冊上，頁275。

¹¹⁴ 蘇軾：〈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蘇軾詞編年校注》，冊上，頁356。

¹¹⁵ 蘇軾在〈秦太虛題名記〉中江赤壁之游作為抒懷故舊往事之媒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見《蘇軾文集》，冊二，頁398-399。而在鄭文焯（1856-1918）的《手批東坡樂府》中則評〈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一作：「此足徵是翁坦蕩之

而此刻正是東坡遊覽赤壁之時¹¹⁶，故也就在作品中不時表露：「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於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的物我無盡之理¹¹⁷，與「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¹¹⁸的生命無常等「心事」疊影。故就東坡的文學史價值而言，黃州赤壁的作品確立了蘇軾突破文體限制的美學意義¹¹⁹，東坡利用由「詞」到「賦」的文體抉擇，呈現其對自我生命歷程的精神轉變¹²⁰，使得「東坡赤壁」也成為後世抒情典型的重要意象¹²¹；但就「赤壁意象」在中國文學史中的流變意義來看，「東坡赤壁」則是首度將「赤壁之戰」的題材脫離過去歷史論述的脈絡中，成為文人抒懷「心事」，辯證自我生命存在的新題材¹²²。

懷，任天而動。」引自《蘇軾詞編年校注》，冊上，頁356。

116 如蘇軾〈李委吹笛·并引〉中所言：「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鶻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見〔清〕馮應榴（1741-1801）輯注：《蘇軾詩集合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冊三，頁1104。可見「赤壁磯」已成東坡在黃州時期燕飲雅集之重要地點。

117 引文為蘇軾：〈赤壁賦〉。見《蘇軾文集》，冊一，頁6。又羅大經《鶴林玉露》評曰：「《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設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也，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安在？況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怨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引自曾濤、曾棗莊編：《蘇文彙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頁8。

118 蘇軾：〈後赤壁賦〉。見《蘇軾文集》，冊一，頁8。

119 葉嘉瑩已對東坡「以詩為詞」的文體創造與美學意義提出論述，見氏著：〈論蘇軾詞〉，《中國蘇軾研究》第三輯（2007年2月），頁180-215。

120 劉少雄於〈文體的抉擇〉一文中曾指出：「此詞（〈念奴嬌·赤壁懷古〉）由自然而歷史而人物，對照生命的無常與個人失志之悲，最後想回歸現實加以紓解時，篇幅已不甚足夠。……東坡另外的赤壁文學，捨詞而取賦體，可見他不想深陷於情緒中，想以更明白理性的態度、更長的篇幅來探索這難解的人生課題。」見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從風騷到戲曲——第一屆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年5月），頁172-174。

121 衣若芬在〈戰火與清遊——赤壁圖題詠論析〉一文中整理了後世題詠「赤壁圖」的主題之一，即以東坡的際遇或達觀心胸。本文收錄於《故宮學術季刊》第18卷第4期（2001年7月），頁63-102。

122 〔清〕黃氏：《蓼園詞評》曾云：「題是懷古，意味自己消磨壯心殆盡也。……題是赤壁，心實為己

故東坡完成以「心事」來詮釋「赤壁意象」的抒情典型，這也造成日後眾多歌詠「東坡赤壁」的作品，而其中又俱以東坡清遊為詠懷題材，如：

長歌赤壁東坡賦，又詠歸來元亮詞。¹²³

赤壁舞濤頭。周郎還到不。倚西風、嫋嫋餘愁。喚起橫江飛道士，來伴我、月中游。¹²⁴

峨眉仙客。四海文章伯。來向東坡遊戲，人間世、著不得。去國誰愛惜。在天何處覓。但見尊前人唱，前赤壁、後赤壁。¹²⁵

赤壁磯頭，臨皋亭下，扁舟兩度經過。江山如畫，風月奈愁何。三國英雄安在，而今但、一目煙波。風流處，竹樓無恙，相對有東坡。¹²⁶

愛舉眉山公舊話，與客泛舟赤壁。一自奎星，去朝帝所，歎洞簫聲息。空餘二賦，至今淒動金石。¹²⁷

甚至直接以注東坡前後《赤壁賦》為詞旨：

壬戌孟秋，蘇子夜遊，赤壁舟輕漾。觀水光、彌渺接遙天，月出於東山之上。與客同，清歡扣舷歌詠，開懷飲酒情酣暢。如羽化登仙，乘風獨立，飄然遺世高尚。客吹簫、音韻遠悠揚。怨慕舞潛蛟、動淒涼。¹²⁸

或

泛舟赤壁，正風徐波靜，舉尊屬客。渺渺予懷天一望，萬頃憑虛獨立。桂槳空明，洞簫聲徹，怨慕還淒惻。星稀月淡，江山依舊陳跡。因念醞酒臨江，賦詩橫槊，好在今安適。謾寄蜉蝣天地爾，瞬目盈虛消息。江上清風，山間

而發。」實可作為對「東坡赤壁」意象的定評。引自《蘇軾詞編年校注》，冊中，頁401。

¹²³ 徐經孫：〈鷓鴣天〉。見唐圭璋（1901-1990）編：《全宋詞》（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冊四，頁2721。

¹²⁴ 劉辰翁（1231-1294）：〈唐多令〉。見《全宋詞》，冊五，頁3216。

¹²⁵ 甄龍友：〈霜天曉角〉。《全宋詞》，冊三，頁1516。

¹²⁶ 戴復古（1167-?）：〈滿庭芳〉。《全宋詞》，冊四，頁2304。

¹²⁷ 劉克莊（1187-1269）：〈念奴嬌〉。《全宋詞》，冊四，頁2604。

¹²⁸ 曹冠：〈哨遍〉。《全宋詞》，冊三，頁1540。

明月，與子歡無極。翻然一笑，不知東方既白。¹²⁹

上列諸詞的共同特色，就是其所描寫的「赤壁」與歷史上的「赤壁之戰」漸行漸遠，與三國歷史相關的「周郎」、「三國英雄」、「釃酒臨江」、「賦詩橫槊」等物事，俱為襯托東坡清遊赤壁、憑虛獨立的道具，所有的作者皆將焦點置於東坡的貶謫際遇與豁達風流之貌，顯然其也成為後世文人共同的嚮往，證明了自東坡以「心事」作為對赤壁詮釋的新途徑後，也使「東坡赤壁」完全擺脫過去自「國事」至「史事」架構下的歷史探討，而成為獨樹一幟的抒情典型。

五、毛宗崗重塑以「赤壁之戰」為主的「故事」脈絡

由此可知，自從東坡以後，「赤壁意象」漸離過去「國事」與「史事」的糾纏，而轉成個人抒志的象徵，一直到清初毛宗崗引用楊慎〈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置於《三國志通俗演義》卷首，則又將歷史意義的「赤壁之戰」影像，重新與東坡以來的「心事」模型交相疊映，不僅令三國與「赤壁之戰」在「故事性」的喧染聲中重新接軌，也建構其以「赤壁之戰」為主軸的敘事模式。

楊慎之詞本為《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中第三段評說「秦漢史」所作：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¹³⁰

自鄭振鐸（1898-1958）起，即已視之為清人彈詞之祖¹³¹，而楊慎作此之目的，除了

¹²⁹ 林正大：〈括齋江月〉。《全宋詞》，冊四，頁2447。

¹³⁰ 見〔明〕楊慎：《歷代史略詞話》。收錄於王文才輯校：《楊慎詞曲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頁293。

¹³¹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收錄於鄭爾康編：《鄭振鐸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11月），卷七，頁553-555。

讀史啓蒙之外¹³²，或有抒發其貶戾滇南、人生無常之嘆¹³³，有人已注意其起句乃化於東坡〈念奴嬌·大江東去〉，然若逐字逐句對照，可發現楊慎此作幾乎套用東坡赤壁懷古的思維模式：

楊慎·臨江仙	蘇軾·念奴嬌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大江東去，浪淘盡， 千古風流人物。
青山依舊在。	江山如畫，
是非成敗轉頭空。 幾度夕陽紅。	一時多少豪傑！故壘西邊人道是， 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 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早生華髮。人間如夢， 一樽還酹江月！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 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王思宇曾評析楊慎之作謂：

上片咏史，文義已盡，下片另起頭緒，引入漁樵閒話，文意卻與上片似斷實連。上片全就長江和江上景物寫，下片重點則轉到江上的人，同時仍以江上之景——秋月春風為襯托。此片構思亦從蘇軾《前赤壁賦》『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化出。特寫『白髮漁樵』，是因為他們飽經世事，閱歷豐富。

134

這段析解指出了「東坡赤壁」意象對於楊慎的影響，也指出「漁樵」視角自東坡以來的傳承，然此處本是東坡欲擺脫「赤壁之戰」的歷史糾纏所設計的敘事角色，在楊慎處顯然又與秦漢史發生關連，而至毛宗崗批點《三國志通俗演義》時，則沿襲著楊慎對於漁樵敘事的立場，卻藉此闕詞轉變了羅貫中對《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故事」架構，而以「赤壁之戰」作為毛批本的「故事」主體。

¹³² 王文才：〈楊升庵學行述略〉。收錄於林慶彰、賈順先編：《楊慎研究資料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年9月），頁112-113。

¹³³ 曾紹皇、吳波：〈《廿一史彈詞》與楊慎人生價值體系的自我調整〉，《中國文學研究》第4期（2006年），頁88-91。

¹³⁴ 王思宇：〈〈臨江仙〉賞析〉。參《楊慎研究資料彙編》，頁302。

在羅貫中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中，與「赤壁之戰」有關的內容共計有：

「諸葛亮舌戰群儒」、「諸葛亮智激孫權」、「諸葛亮智說周瑜」、「周瑜定計破曹操」、「周瑜三江戰曹操」、「群英會瑜智蔣幹」、「諸葛亮計伏周瑜」、「黃蓋獻計破曹操」、「闕澤密獻詐降書」、「龐統進獻連環計」、「曹孟德橫槊賦詩」、「曹操三江調水軍」、「七星壇諸葛祭風」、「周公瑾赤壁鏖兵」、「曹操敗走華容道」、「關雲長義釋曹操」¹³⁵

顯然在羅貫中的時代已經將「赤壁之戰」的主力視角轉移到諸葛亮身上¹³⁶，在這十六回的篇幅中，羅貫中事實上已經重構了「赤壁之戰」的故事結構：「歷史記載這次戰爭十分簡略。……什麼『舌戰群儒』、『孔明借箭』、『苦肉計』、『連環計』、『曹操賦詩』、『諸葛祭風』等等，都非史實。獻計火攻的本是黃蓋，並不是周瑜與諸葛亮的合謀；操軍船只是本身連接，也非龐統巧授連環計；至於當時情景的想像，並無根據。總之，《三國志演義》中有關赤壁之戰的描寫，虛構多於事實。」¹³⁷不過從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則可察覺當時對於所流傳的「三國故事」，確是深信不疑的：

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譽錄，以便觀覽，則三國之盛衰治亂，人物之出處臧否，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於心胸矣。其間亦未免一二過與不及，俯而就之，欲觀者有所進益焉。¹³⁸

可知當時不但視羅貫中所編撰本乃損益陳壽正史的「事紀其實」之作，即使仍有「一二過與不及」，然時人仍認為羅貫中實有所寄寓於書中，此即蔣大器所謂「里巷歌

¹³⁵ 俱見羅貫中著：《明弘治版三國志通俗演義》（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10月），頁365-423。

¹³⁶ 〔清〕顧家相（1853-1917）《五餘讀書廬隨筆》曰：「一日，偶檢《淵鑿類函》，竟載有諸葛祭風事，云出《說蒼》。《說蒼》不知何書，而《淵鑿類函》乃欽定書，皆經登載，則詞章家竟可引用矣，乃嘆羅貫中並非杜撰。」見《三國演義資料匯編》，頁609。

¹³⁷ 范寧（1916-1997）：〈《三國志演義》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參氏著：《范寧古典文學研究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年6月），頁504。

¹³⁸ 見《明弘治版三國志通俗演義》，序頁1。

謠之義」。因此，如林瀚（1434-1519）編《隋唐演義》時即曰：

羅貫中所編《三國志》一書行於世久矣，……第其間尚多缺略，因於退食之暇，遍閱隋唐諸書所載英君名將、忠臣義士，凡有關於風化者，悉為編入，名曰《隋唐志傳通俗演義》。蓋欲與《三國志》並傳於世，使兩朝事實愚夫愚婦一覽可概見耳。¹³⁹

可知所謂的「里巷歌謠之義」即為「有關於風化者」，因此這也令羅貫中在順次敘述董卓之亂、群雄割據、曹操入洛、北定中原、劉備入蜀、兼併漢中、荊州之爭、夷陵之戰、六出祁山與北伐中原等故事時，乃隨著漢末三國的歷史而起伏，故「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衍，非無中生有者比也。」¹⁴⁰的觀點，成為對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基本閱讀立場¹⁴¹。

而毛宗崗日後整理羅《本》十，畫龍點睛地引用楊慎〈臨江仙〉詞於卷首，則更加強了對《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史實信任感，即使其仍存在「七實三虛」¹⁴²之疑慮，但無損其將「東坡赤壁」與楊慎〈臨江仙〉與歷史重新接軌的效果，且也使「赤壁之戰」成為籠罩《三國志通俗演義》的閱讀視角。毛批本對「赤壁之戰」的篇幅，顯然比羅貫中更為龐大，計有：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讎、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板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群儒 魯子敬力排眾議、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會蔣幹中計、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

¹³⁹ 〔明〕林瀚：〈隋唐演義序〉。見《三國演義資料匯編》，205。

¹⁴⁰ 〔清〕劉廷璣（?-1676）：《在園雜志》。見《三國演義資料匯編》，425。

¹⁴¹ 〔清〕清溪居士：〈重刊三國志演義序〉：「演義之作，濫觴於元人，以供村老談說故事。然悉本陳志裴注，絕不架空杜撰，意主忠義，而旨歸勸懲。」見《三國演義資料匯編》，426。

¹⁴² 〔清〕章學誠（1738-1801）曰：「惟《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見氏著：《丙辰筴記》，收錄於《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外編卷三，頁53。又管達如亦言《三國演義》：「其所述之事實，大抵真者一而偽者九。」見《三國演義資料匯編》，437。

受刑、第四十七回 關澤密獻詐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第四十八回 宴長江
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
火、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
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桂
陽、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¹⁴³

兩年之間（建安十二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 207 年到 208 年）卻足足用了十六回，讓史籍中的眾多事件能充份的發揮，但顯然毛宗崗不僅延續了東坡赤壁對三國人物風流的懷念：「古人亦有善用古人之文者：橫槩之歌多引《風》、《雅》之句，而坡公《赤壁賦》一篇亦取曹操歌中之義而用之。」¹⁴⁴也交疊著自平話系統至羅貫中以下「擁劉貶曹」的敘事模式¹⁴⁵，而最終藉由楊慎〈臨江仙〉一詞作為二者互為疊影之重奏曲，使得原受東坡「心事」抒情模式所移轉的「赤壁意象」歷史脈絡，又巧妙地匯集於毛宗崗所完成的「故事」體系。

六、結論

由本文的研究可以發現，「赤壁意象」在中國文學發展中，其實有一條自「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軌跡，而這四階段的演變卻又彼此交互疊影，融合後再度形成新的詮釋系統，也令「赤壁之戰」的故事成為流傳千古、家喻戶曉的重要戰役。

¹⁴³ 參見〔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批評：《三國演義》（孟昭連等校點本，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6月）。

¹⁴⁴ 同前注，頁379。

¹⁴⁵ 張力與李楠合著的〈試析《三國演義》兩個高峰的藝術效果〉一文中指出：「陳壽的《三國志》在有關人物傳記裡分別記載了這場戰爭（赤壁之戰），語焉不詳而又零散。惜墨如金的司馬光用兩千多字將赤壁之戰的全貌展現在讀者眼前。……《三國志平話》不失為歷史小說的雛形，有虛構，有誇張，有幻想，赤壁之戰也寫了五六千字。……吸取南宋朱熹以來形成的是非觀：是劉非曹，尊蜀貶魏，…。把孔明寫成戰爭的導演和主角。……這場戰爭羅貫中整整寫了七回，……《演義》中孔明仍是核心人物。」則可大略窺見「赤壁戰爭」在三國故事系統中演變的脈絡。見《三國演義學刊》（二），頁265-266。

首先是陳壽面對當代史的尷尬與為難，在必須兼顧實錄的原則下，其巧妙地採取三國各自能接受的立場描述這場大戰，顯然慘敗的曹魏以「疫疾」為脫辭；至於蜀漢則極欲攬功，故強調促成孫、劉結盟的合作；而孫吳為此役之主力部隊，故不惜筆墨極盡描寫戰爭的過程。三國各自維護本國利益的立場，造成國與國間的競爭，其餘緒甚至延續到南北朝，足見分裂政局下，因「國事」之爭而各自論述符合其利益的「赤壁意象」。裴松之才提高至「統一觀」與「天命觀」，作為對「赤壁之戰」的評論視角，也打開了後世客觀論史的契機。至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衡諸各方史料，利用兩千一百五十字的篇幅將「赤壁之戰」的來龍去脈，清晰而簡要地完整呈現，也完成了對「赤壁之戰」的還原，令「赤壁意象」進入客觀實證的「史事」研究系統。但東坡自覺地脫離歷史糾纏來解釋「赤壁意象」，結合其貶宦際遇之人生感悟，與抽離歷史回歸自我之辨證旅程，於是藉由「心事」的私密視角，建構了自我抒情典型的「東坡赤壁」意象，而開啓後世詠懷赤壁的新徑路，卻也令「赤壁意象」與歷史上的「赤壁之戰」漸行漸遠。但在毛宗崗巧妙地利用楊慎〈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的作品，置於《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卷首，則再度令以偏離歷史軌道的「東坡赤壁」，重新與「史事」聯繫，而楊慎之作也令「赤壁之戰」產生籠罩三國故事的閱讀效應，故毛批本《演義》不僅引導「赤壁意象」再度回流歷史論述的脈絡，也藉「赤壁意象」建構其敘述「故事」的重要視角。是故，我們可以說，「赤壁意象」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四階段流變，而為彼此相互影響與交疊的四重奏。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唐圭璋編，《全宋詞》，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
- 章學誠，《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
- 羅貫中著，《明弘治版三國志通俗演義》，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10月。
- 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3月。
- 王文才輯校，《楊慎詞曲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
-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月。
- 劉恕，《通鑑外紀》，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景印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世界書局，1989年4月。
- 喬治忠校注，《眾家編年體晉史》，天津：古籍社出版，1989年。
-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月。
-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9月。
- 姚察、姚思廉、魏徵合撰，《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9月。
-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9月。
- 曾濤、曾棗莊編，《蘇文彙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
- 趙彥衛，《雲錄漫鈔》，傅根清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5月。
- 劉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8年9月。
- 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2月。
- 趙翼撰，《二十二史劄記》，臺北：世界書局，2001年8月。
- 袁宏，《後漢紀》，收錄《兩漢紀》，張烈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6月。
- 仇兆鰲撰，《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月。
- 嚴可均輯，《全晉文》，何宛屏等審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2月。
-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評，《三國演義》，孟昭連等校點本，長沙：岳麓書社，2006

年6月。

蕭統編、李善注、胡克家考異，《文選》，李培南等點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0月。

鄒同慶、王宗堂著，《蘇軾詞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0月。

劉運好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12月。

吳在慶撰，《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0月。

近人論著

《三國演義學刊》編輯委員會編，《三國演義學刊》（二），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8月。

王文進，〈論裴松之的統一觀〉，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六朝學刊》第1期，2004年12月。

——，〈論《江表傳》中的南方立場與東吳意象——以全新的角度解讀裴松之《三國志注》〉，宣讀於2009年12月30日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咖啡與學術」講論會。

王德毅，〈司馬光的史學〉，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編《紀念司馬光、王安石逝世九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10月。

王炳厝，〈略論陳壽《三國志》迴護司馬氏——讀趙翼《廿二史札記》有感〉，《福建學刊》第6期，1997年。

石守謙，〈古蹟·史料·記憶·危機〉，《當代》第92期，1993年12月。

衣若芬，〈戰火與清遊——赤壁圖題詠論析〉，《故宮學術季刊》第18卷第4期，2001年7月。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

汪榮祖，《史傳通說》，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9月。

李耀仙，〈《三國志》新衡〉，《中華文化論壇》第1期，1994年。

李純蛟，《《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9月。

林語堂撰、張振玉譯，《蘇東坡傳》，臺南：德華出版社，1979年11月。

- 林慶彰、賈順先編，《楊慎研究資料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年9月。
- 吳懷祺，《中國史學思想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5月。
- 孫紹華，〈《三國志》和陳壽的史識〉，《史學史研究》第2期，1997年。
- 馬艷輝〈《三國志》裴注的理論價值〉，《中州學刊》第3期（總159期），2007年5月。
- 許綱，《詠史詩與中國泛歷史主義》，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8月。
- 范寧，《范寧古典文學研究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年6月。
- 遼耀東，〈司馬光《通鑑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臺大歷史學報》第21期，1997年12月。
- 曾紹皇、吳波，〈《廿一史彈詞》與楊慎人生價值體系的自我調整〉，《中國文學研究》第4期，2006年。
- 張須，《通鑑學》，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2年9月。
- 張元，〈通鑑中的南北戰爭〉，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編《紀念司馬光、王安石逝世九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10月。
-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
- 張新科，〈《三國志注》所引雜傳述略〉，《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5期，2003年9月。
-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10月。
- 葉嘉瑩，〈論蘇軾詞〉，《中國蘇軾研究》第三輯，2007年2月。
- 盧建榮，〈裴松之歷史評論的思想根源——兼論尊經傳統的回應〉，收錄於《中國歷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盧曉衡編，《關羽、關公和關聖——中國歷史文化中的關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1月。
- 劉少雄，〈文體的抉擇〉，收錄於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從風騷到戲曲——第一屆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年5月。

鄭爾康編，《鄭振鐸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11月。

韓國磐，〈《資治通鑑》如何記述赤壁之戰〉，《社會科學戰線》第4期，1982年。

齊益壽，〈多重「對話」與「讀者」反應——陶淵明三首「以史為體」的詠史詩探微〉，收錄於洪漢鼎、傅永軍編，《中國詮釋學》第五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繆鉞，《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店，1978年12月。

Hoyt Cleveland Tillman，田浩，〈史學與文化思想，司馬光對諸葛亮故事的重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一分，2002年3月。

